



CISS海外信息专报

(2026年4月1-3日)

1、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人工智能时代构建以人为本的劳动力政策体系

3月25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发表高级研究员索雷尔·弗里德勒（Sorelle Friedler）等人的文章《人工智能时代以人为本的未来工作愿景》。文章认为，人工智能正在加剧劳动力替代与工作质量恶化的趋势，但其根源并非技术本身，而是劳动者议价能力下降、监管机构执行力不足以及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长期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国家应通过以人为本的劳动力政策重塑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秩序。文章提出三方面的应对路径：一是出台执照与最低人员配置等要求，引导劳动者从事教学、护理等服务类职业。二是提高上述职业的工作待遇、社会地位与专业自主性，同时建立再培训路径，促进更多劳动者的中期职业转型。三是建立政府、企业、工会三方协作机制，共同参与人工智能设计，使其更适配劳动者的实际工作场景。文章强调，国家应通过有力而系统的政策干预，将人工智能引导为改善就业与公共服务的工具，而非加剧阶级差距的力量。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a-people-first-vision-for-the->

future-of-work-in-the-age-of-ai/

编译：程果

2、法国 24 小时新闻台：人工智能重塑现代战争杀伤链引发多重安全风险

3 月 21 日，法国 24 小时新闻台网站发表伦敦大学城市圣乔治学院高级讲师迪娅·古普塔（Diya Gupta）的文章《简化杀伤链：人工智能如何改变现代战争》。文章聚焦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中人工智能的实战应用，认为美军借助人智能工具将原本数天的作战流程压缩至秒级，完成超 5500 个目标打击，大幅简化作战杀伤链，正深度重塑现代战争形态。文章指出，当前军用人工智能应用存在三大核心风险：一是人工智能系统准确率严重不足，生成式大模型准确率最低仅 50%，部分目标识别系统准确率甚至不足 30%，系统“黑箱”特性导致责任难以追溯，自动化偏见让人类监督流于形式；二是国家安全隐患突出，大模型训练数据缺乏有效管控，易被植入后门或受虚假信息操控，供应链安全无法得到保障；三是冲突升级风险加剧，相关模拟研究显示，人工智能会弱化核禁忌，在核危机场景中大幅提升核冲突升级的概率。文章强调，当前全球军用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缺乏充分的安全与有效性验证，美军的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模式应成为国际社会的警示案例。

<https://www.france24.com/en/middle-east/20260321-streamlinin>

编译：钟珺雯

3、英国查塔姆研究所：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常态化与风险

3月27日，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发表全球治理与安全中心研究运营主管尼尔扎·阿马拉尔（Nilza Amaral）的文章《伊朗战争凸显人工智能在战争中日益广泛的应用》。文章认为，人工智能在提升军事效率的同时也带来显著风险，需以软治理加以约束。文章以2月美以联军空袭伊朗学校事件为切入点，认为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选择已引发广泛担忧。美国“Maven系统”、乌克兰战场的视频分析以及以色列在加沙的目标识别应用表明，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已成全球趋势，并凭借高效数据处理与加速决策能力，逐步成为现代战争常态。然而，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带来的安全风险依然突出。技术层面，大语言模型基于统计概率运行，难以保证结果始终准确。制度层面，人工智能能力与人类使用规则之间存在明显错位，在人类监督不足的情况下，出错概率将被放大。同时，人工智能引入的新复杂性对现有国际法构成挑战，但短期内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框架很难实现。因此，文章主张以软性治理对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进行有限规范：一是军队自身建立使用规则，减少过度依赖导致的误伤；二是推动政府、企业与学界合作，共同制定“人机协作”规范。文章最后强调，国际社会需持续就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应用开展讨论与协调，

否则其潜在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剧。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6/03/iran-war-highlights-creeping-use-ai-warfare>

编译：杜宛鸿

4、美国兰德公司：中美人工智能开放模型竞争形势分析

3月26日，美国兰德公司发表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分析副主任欧文·J.丹尼尔(Owen J. Daniels)和高级研究分析师汉娜·多门(Hanna Dohmen)的文章《开放模型、软实力与中美人工智能竞争范围》。文章认为，中美在人工智能开源模型领域存在竞争态势，开源模型正成为双方争夺全球影响力的关键软实力工具。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通过建立开放模型生态、促进公私合作和支持计算资源获取维持技术领先地位。中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行动计划》则倡导开放共享理念，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将本国模型嵌入全球技术栈，采用宽松许可降低应用门槛，扩大全球用户规模。中国开源模型战略起步早于美国，Deep Seek、Moonshot AI等模型因高性能与低使用限制，在全球南方国家的研发与商业群体中获得广泛采用，形成技术与基础设施的潜在锁定效应。美国拥有Meta、OpenAI等领先企业，但其模型的商业使用限制普遍更多，这会限制其全球渗透率，削弱其软实力优势。开放模型的竞争不仅关乎技术创新，更将深刻影响中美两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与影响力格局中

的长期地位。

<https://www.rand.org/pubs/perspectives/PEA4686-1.html>

编译：张佳延

5、英国查塔姆研究所：打破人工智能治理僵局

3月30日，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发布罗文·威尔金森（Rowan Wilkinson）、亚历克斯·克拉索多姆斯基（Alex Krasodonski）等人合著的研究报告《打破人工智能治理僵局：危机如何推动全球协调》。报告认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人工智能的政治经济结构：大国将国家竞争优势置于国际合作之上，中等强国倾向于争取技术准入而非推进监管，国际机构缺乏执行力与技术能力，私人投资规模远超监管预算，各方在基本事实的判断上亦存在分歧。报告认为，当不作为的代价超过协调成本时，有约束力的全球治理才可能实现，而这一转变往往依赖重大危机的催化。报告以2008年金融危机、WannaCry勒索软件攻击等案例为参照，提炼出危机驱动治理成功的四项关键条件：明确的危机框架界定、合法权威的快速集中、既有协调机制的激活，以及各主要行为体激励的基本对齐。基于上述分析，报告向各国政府提出六项建议：争取尽早制定相关治理框架与模块化协议，强化人工智能安全机构的技术权威地位，开发应急技术干预工具（如模型关停协议与熔断机制），构建有效的危机传播叙事，建立类似冷战“热线”的外交后台沟

通渠道，以及改善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6/03/breaking-deadlock-ai-governance>

编译：张朔宁

6、美国进步研究所：对华出口人工智能芯片或将挤占美本土产能

3月27日，美国进步研究所（IFP）研究员乔治娅·亚当森（Georgia Adamson）与新兴技术政策主任蒂姆·菲斯特（Tim Fist）发表文章《对华增加人工智能芯片供应何时意味着美国供应减少》。2026年1月，美国工业和安全局（BIS）出台新规，允许在不影响美本土供应前提下，逐案审批对华出口英伟达 H200 等芯片。基于此，作者认为对华出口芯片可能触发美中之间的“零和竞争”，即中国获得算力的同时，美国芯片供应与算力将相应受限。文章首先界定“芯片转移”的两种情形：一是对华订单将消耗原本可供美国客户购买的库存芯片；二是为中国生产新芯片占用原本用于生产更先进美国芯片的制造产能。作者评估认为：第一，芯片库存层面是否构成“供给转移”尚存不确定性，需依赖美国客户在既定价格下的真实需求及订单数据加以判断；第二，H200 芯片与更先进芯片在先进制程、高带宽存储（HBM）及先进封装等关键要素上存在竞争，若相关资源被用于生产 H200 芯片将挤占美国先进芯片产能；第三，在供给缺乏韧性的条件

下，美国算力损失将呈现乘数效应，每向中国出口一颗 H200 芯片，美国在先进芯片上损失的计算性能可达前者的 1.7 至 2.5 倍。文章建议，美工业和安全局（BIS）应在许可审查中全面收集订单、价格及产能分配等关键信息，综合评估库存与产能转移风险，避免对华出口对美国芯片供应与算力造成潜在影响。

<https://ifp.org/ai-chip-supply-diversion/>

编译：高美琳

7、美国兰德公司：预防人工智能灾难性风险的法律与政策路径

3 月 25 日，美国兰德公司（RAND）发表高级政策研究员萨沙·罗曼诺斯基（Sasha Romanosky）、高级政策师艾丽娜·特雷格（Elina Treyger）、高级信息科学家埃利·阿尔哈贾尔（Elie Alhajjar）撰写的研究报告《减轻人工智能灾难性损害的法律与政策路径》。报告基于对 14 位顶尖法律、政策与技术专家的德尔菲（Delphi）调研，系统评估了未来 5 至 10 年内预防人工智能引发大规模生命损失或财产破坏的 11 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报告认为，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在生物武器研发、大规模网络攻击及系统对齐失效等领域带来的风险日益凸显，亟需构建多维度的治理框架。在所有评估工具中，专家一致认为风险发现与负责任披露激励机制（如漏洞赏金计划、举报人保护制度）以及行业自律性安全规范最具

推广前景。这些措施能够利用社会与行业力量主动发现潜在危险，且执行成本较低。相比之下，强制审计、强制安全标准及主体准入限制等刚性手段虽然震慑力强，但在实际可行性低。文章建议决策者在等待科学证据完善的同时，优先推动当下即可落地的渐进性举措，以透明度建设和问责机制构建为切入点，为更系统的治理路径创造条件。具体建议包括：通过建立法律豁免机制，为在受控环境下测试模型边界的第三方研究人员提供保障，并利用保险行业的合规要求引导企业行为。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4266-1.html

编译：张方琼宇

8、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人工智能算法与模型出口管制的潜力与局限

3月25日，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网站发表研究员科利亚·布洛克曼（Kolja Brockmann）的专题分析文章《人工智能算法、训练数据与模型转让的监管：出口管制的潜力与局限》。文章认为，随着人工智能在武器系统、监控及情报工具中的广泛应用，各国日益探索将出口管制作作为防范人工智能技术滥用、维护军事优势的治理工具，但现行多边出口管制标准对人工智能算法、训练数据及模型的适用性仍存在解释分歧，人工智能转让须依赖数字取证等专项手段，合规难度较高。文章就强化出口管制提出四点建议：

明确触发管制的人工智能终端用途类型，涵盖全自主武器系统；完善相关技术与软件的认定指引；增列敏感人工智能技术管制条目（如人脸识别系统）；将军事终端用途管制扩展至高风险目的地与用户群体。文章强调，出口管制对防止人工智能算法与模型滥用的作用有限，需与负责任创新框架、采购规范及制裁措施协同推进。

<https://www.sipri.org/commentary/topical-backgrounders/2026/regulating-transfers-ai-algorithms-training-data-and-models-potential-and-limitations-export>

编译：孙韵雯

9、美国《外交事务》：美国开启“混合经济战”新模式

3月27日，美国《外交事务》发表乔治城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彼得·哈雷尔（Peter E. Harrell）的文章《美国的新经济战争》。文章认为，美国经济制裁手段正发生根本性转向。2025年年底以来，特朗普政府打破了长期以来经济制裁与军事行动之间的界限，开始动用海军和海岸警卫队在公海拦截并扣押委内瑞拉、伊朗等国的油轮，将经济制裁升级为“混合经济战”。这种转变的主因在于传统制裁效力因“影子舰队”的崛起和替代性全球经济网络的形成而大幅削弱。虽然军事介入在短期内恢复了制裁威慑力，但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文章认为，这种缺乏明确法理基础和战略准则的行动，不仅容易引发俄罗斯等国军事对峙风险，还

可能导致别国针对美国商船进行报复性扣押。文章警示了网络战在经济对抗中的泛化倾向。鉴于这种“混合战争”模式对全球贸易安全和国际准则的冲击，美国政府必须建立一套关于何时及如何使用武力支持制裁的明确学说，以避免陷入无序的全球报复循环，并防范对美国长期经济利益与外交公信力的反噬。目前，美国正处于一种缺乏方向感的扩张性经济对抗中，其后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americas-new-way-economic-war>

编译：陈奕好

10、美国胡佛研究所：战场胜利与政治制约下的美国对伊战争

3月31日，美国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发表其高级研究员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题为《围绕伊朗的两场战争：历史语境下的探析》的文章。文章分析美国对伊冲突在外部战场与国内政治空间的双重结构，认为国内政治反对声浪与叙事偏差，正使本可取胜的战争面临在政治层面被“输掉”的风险。军事层面，文章对美以联军作战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美军已在短时间内实现对伊朗的空中压制与关键战力削弱，以相对有限的伤亡与成本接近既定战略目标，呈现出典型“低成本、高效率”的作战特征。但在美国国内，这一军事进展却被持续重构为“失

败”，其根源不在战场，而在政治。首先，这种“失败叙事”脱离战场实际，而是通过抬高目标门槛。反对派尤其是左翼以政权仍存为由，否定原本以削弱、遏制为导向的战争目标。其次，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战争议题被纳入党派竞争框架，成为影响支持率与国会控制权的工具性议题；此外，政府在信息传递上侧重技术性战果叙述，忽视战争不确定性客观阐述，进一步放大公众认知落差，削弱政策可信度。文章认为，在高度极化的民主政治环境中，战争的最终成败很大程度受政治叙事影响，若政府无法在国内政治中有效界定目标、管理预期并维持可信沟通，即使获得军事胜利也可能在政治中“输掉另一场战争”。文章呼吁美国政府在战争中需改进信息传递方式，回应左翼与右翼偏激叙事，明确美以合作的战略合理性。

<https://victorhanson.com/the-two-wars-for-iran-the-war-in-a-historical-context/>

编译：贺宇希

11、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联邦政策的转变如何蚕食“美国梦”

3月3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发表高级研究员加布里埃尔·R.桑切斯（Gabriel R. Sanchez）和新墨西哥大学博士生大卫·A.洛佩斯·阿马亚（David A. Lopez Amaya）的文章《联邦政策的转变如何蚕食“美国梦”》。文章认为，移民在历史上推动了“通过努力可以向上流动，实现幸福繁

荣”的“美国梦”叙事，并通过投票、社会运动等方式参与政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行动对移民的政治参与产生寒蝉效应，有必要通过政策干预应对这一挑战。其一，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此举可能导致针对移民的不平等。国会应审视这些政策在投票站存在的问题。其二，各州有必要主动采取措施，推动新移民融入本地经济体系。童年时期被带入美国，但缺乏合法身份的“梦想者”（Dreamers）群体被驱逐出境，象征着追求“美国梦”所面临的制度性阻碍。具体来看，相较于美国公民，拉丁裔移民对“美国梦”更具信心。然而，2024年美国大选之后，45%的拉丁裔移民认为实现“美国梦”更加困难，32%的拉丁裔移民认为“美国梦”曾经可以实现，但已经不再如此。在更民族主义的政策取向下，更强的执法力度加剧了移民群体与“美国梦”承诺间的裂痕。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eroding-the-american-dream-through-federal-policy-shifts/>

编译：高靓瑜

12、美国 CNAS：特朗普 2.0 贸易战的现状、得失与未来

3月30日，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发表其能源、经济与安全项目主任兼高级研究员艾米丽·基尔克里斯（Emily Kilcrease）与高级研究员杰弗里·格茨（Geoffrey Gertz）的文章《解放日一年后，特朗普的贸易战能否被挽救？》。文

章分析了在“解放日”宣布实施严苛的全球关税一年后，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合理性与失误，并提出其对美国盟友的影响。文章认为，虽然特朗普政府认识到美国此前的贸易政策处于不良平衡，巧妙运用了杠杆策略，但未考虑到有效的经济胁迫不仅需要对他国政府施加成本的可信威胁，还需要在伙伴满足美国要求后提供免受未来威胁的可信承诺。文章认为，美国的贸易制裁若演变为粗暴的胁迫来威胁欧洲主权，反而会对跨大西洋联盟造成腐蚀性影响。同时，特朗普政府在与中国博弈时也过度激化矛盾，未能领导盟友与中国“脱钩”，反而陷入孤立。文章呼吁美国盟友应优先确保关键矿产协议的顺利达成。经历一年混乱的贸易战后，当前关键问题在于：对于本届政府剩余任期及未来执政者而言，是否仍存在实现构建新型经济安全架构、降低对华依赖的可行路径。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cnas-insights-year-after-liberation-day-can-trumps-trade-wars-be-salvaged>

编译：李泓静

13、美国 CSIS：美对月球商业开发的新模式与战略路径

3月31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航天战略专家查尔斯·米勒（Charles Miller）的文章《解码月球经济》。文章指出，美国应借鉴地球房地产开发经验，将月球定位为大型基建项目推进建设，摒弃传统政府主导模式，依托成熟地产开发体系与公私合作机制实现商业化运营。

房地产作为全球最大资产类别，总价值约 400 万亿美元，美国长期具备大型复杂基建项目的成熟管理经验。米勒主持的 NASA 资助研究证实，商业合作模式打造月球永久基地兼具技术可行性与经济性价比，相关结论还推动 NASA 落地载人着陆系统、商业月球载荷服务两大核心项目。文章建议，美国牵头组建国际月球开发局（LDA），融合纽约新泽西港务局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治理优势，以准政府机构统筹月球整体基建规划。LDA 优先开发月球资源压缩成本，以美国及其盟友为核心合作主体，通过跨国公私合作完成融资与开发落地。NASA 局长艾萨克曼（Isaacman）主张官方做好前期铺垫引导，由私营部门主导产业运转，构建独立可持续的太空经济。文章强调，特朗普与艾萨克曼的商业背景更契合该创新路径，呼吁美国重构航天商业模式，依托 LDA 长效运营月球经济，为其月球基地战略落地提供支撑。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racking-code-lunar-economy>

编译：白一冰

14、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美军应重点打击海湾岛屿网络

3 月 30 日，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发表高级研究员坎·卡萨波格鲁（Can Kasapoglu）文章《审视美国针对哈尔格岛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选项》。文章认为，尽管美以持续军事行动已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伊朗军事能力，但只要伊朗仍能依托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岛屿网络威胁全球海上经济活动，美

国就难以真正迫使其收手。因此，若美国试图打破伊朗对海峡的战略杠杆，就不能只打击单一目标，而需系统性地削弱其在波斯湾的岛屿控制体系。文章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通道。哈尔格岛是伊朗石油出口的主要枢纽，也是支撑其胁迫能力的重要经济重心；格什姆岛、阿布穆萨岛及大小通布岛等，则构成伊朗在海峡入口实施监视、导弹部署和海上拦截的岛屿网络。文章认为，美军当前部署正在为潜在行动塑造条件。随着“的黎波里”号及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进入中东，美国具备了更强的快速反应与空中突击能力。若对哈尔格岛等目标采取行动，美军更可能依赖空中突击，并辅以网络战、电子战、“斩首行动”及对伊朗防空体系的预先压制。但文章强调，此类行动风险极高。伊朗仍保有反舰导弹、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多层拒止能力，“夺岛”后的坚守、补给、防空和持续防御将十分困难。文章认为，美国若要削弱伊朗依托海峡和岛屿网络持续施压的能力，虽属关键一步，却也可能引发长期升级和更广泛的地区经济震荡。

<https://www.hudson.org/defense-strategy/cutting-gordian-knot-u-s-military-options-kharg-island-strait-hormuz-can-kasapoglu>

编译：刘晓

15、美国 CNAS：建立美国经济施压主义指导原则

4月1日，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发表高级研究员艾

米丽·基尔克雷斯（Emily Kilcrease）的报告《全力施压：美国经济施压主义指导原则》。文章认为，美国正处于战后以来最大规模、最新颖方式运用经济施压的历史节点，但缺乏系统性的指导原则。报告基于 20 个历史与现行案例分析，提出美国经济施压九大原则。文章认为，经济施压是美国长期使用的政策工具，而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与战略竞争加剧，使其亟需一套系统化的经济施压原则提供指导框架。报告选取了传统禁运、现代制裁、技术封锁和贸易胁迫四类代表性案例，从 11 项成功标准进行评估，将九大原则分为战略与操作两个层面。战略层面要求决策者建立三种理论：胜利理论、失败理论、克制理论，明确施压需设定清晰目标、失败判定条件及使用边界；操作层面强调结构性杠杆是施压的重心，盟友与对手同等重要，目标国的适应性反制不可避免且影响深远，经济施压应作为动态战役持续校准，投入充足政府资源。作者提出具体实施路径：制定经济施压战略文件、使立法拨款与原则对齐、强制年度行动审查、强化长期战略规划、扩展至战术层面的详细指导。报告强调，经济施压本身不是战略，而是服务于明确外交政策目标的工具。当前美国正处于经济力量运用的关键拐点，建立指导原则可确保经济施压符合美国长期战略利益。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hit-it-with-your-best-shot>

编译：罗方婕

16、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nthropic 与五角大楼对峙折射美国 AI 治理信任危机加深

3月26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技术项目高级主任泰丝·德布朗克-诺尔斯（Tess deBlanc-Knowles）的文章《Anthropic 僵局揭示出围绕人工智能更大的信任危机》。文章认为，Anthropic 与美国国防部围绕 AI 模型使用条款的对峙，已超出企业合同纠纷范畴，折射出美国政府、科技企业与社会公众围绕人工智能负责任使用的信任裂痕不断扩大。Anthropic 在谈判中坚持两条红线，即反对将其模型用于针对美国公民的大规模监控和自制武器，这与美国公众对 AI 的普遍疑虑相呼应。2025 年民调显示，美国人对 AI 的担忧主要集中于安全风险、就业流失、环境负担及技术滥用。文章称，特朗普政府将 AI 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强调服务经济竞争与国家安全，但其主张赋予政府将 AI 用于“一切合法用途”的灵活性，与美国社会要求强化安全与数据规则的呼声相悖。OpenAI 宣布与五角大楼达成协议后，社会反弹迅速升温，ChatGPT 卸载量激增，企业内部也出现公开质疑。文章认为，若政府和科技企业继续将公众疑虑视为可被压制的噪声，而非需要回应的政治信号，美国 AI 政策或将进一步极化，并削弱其在国内推动产业发展及在国际上开展竞争的能力。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dispatches/the-anthropic-standoff-reveals-a-larger-crisis-of-trust-over-ai/>

编译：黄千茹

17、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未来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写在专利之中

3月30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表全球能源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安德烈·科瓦塔留（Andrei Covatariu）的文章《未来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写在专利之中》。文章认为，能源安全已不能仅理解为获取燃料的能力，研发和技术创新正日益决定一国未来能源安全位置及其地缘政治影响力。文章认为，在电池、电网系统、先进材料和能效解决方案等领域占据研发优势的国家会塑造技术标准、掌握价值链位置、影响联盟关系，并强化自身战略自主。专利数量虽不直接等同于技术优势或商业成功，但国际专利家族仍是观察创新强度、战略意图和未来产业位置的较清晰先行指标。文章判断，欧洲当前问题不仅在于高能源价格、监管复杂和资本市场分散，更在于创新生态、研发投入、政策协调和成果转化仍显不足。文章强调，创新并不从属于产业规模，而是先于规模存在。如果欧洲在强调“战略自主”和“技术主权”的同时，未能持续巩固知识产权生成和前沿技术研发能力，其在未来能源体系中的相对劣势恐将进一步扩大。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energysource/the-future-of-energy-geopolitics-is-written-in-patents/>

编译：张泉

18、美国《外交事务》：伊朗战争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3月30日，美国《外交事务》发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刘宗媛（Zongyuan Zoe Liu）的文章《伊朗战争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更担忧美国的失控，而非美国的强大》。文章认为，伊朗战争对中国的真正冲击并不在于美国是否因中东战事被进一步削弱，而在于美国正以更不可预测、更冲动和更不受约束的方式运用其剩余权力，从而破坏中国赖以崛起的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提供的稳定国际环境，包括开放海上通道、稳定能源供给、全球贸易规则、美元金融体系以及能缓冲地缘冲击的多边制度。因此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美国全面退出，而是一个仍能维持基本秩序、却无力遏制中国崛起的美国，而一个失序、躁动、倾向诉诸武力的美国远比一个强大而自制的美国更危险。文章认为，中国虽在短期内对霍尔木兹海峡风险具备一定缓冲能力，包括战略石油储备和持续的伊朗原油输入，但若战争长期化并破坏伊朗及海湾油气基础设施，将严重冲击中国能源安全、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文章强调，中国不会简单地把美国聚焦中东视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机会窗口”，而是更关注一个更分散注意力、但也更依赖武力的美国，是否反而会在台海危机中更具危险性。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what-iran-war-means-china>

编译：郜捷

19、美国 CSIS：伊朗战争冲击倒逼欧洲电气化转型与财政一体化

3月27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欧洲项目主任马克斯·伯格曼（Max Bergmann）与高级顾问费德里科·斯坦伯格（Federico Steinberg）的文章《面对伊朗冲击，欧洲需要采取大胆的经济行动》。文章认为，持续的中东冲突正对欧洲经济造成堪比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严重冲击。经合组织预测，2026年欧元区增长将放缓至0.8%，通胀突破2.5%。若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关闭，欧洲将面临灾难性后果。危机教训层面，2022年俄罗斯断供天然气时，欧洲通过大规模财政转移与转向美国、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展现了惊人韧性。但当时依赖高价进口液化天然气的模式，虽带来地缘优势，却未能解决根本脆弱性。真正的出路在于加速电气化转型。战略行动层面，文章提出三项核心举措：第一，推出新的财政计划，通过补贴鼓励消费者购买欧洲本土电动汽车、安装热泵，其规模应效仿新冠疫情期间的7500亿欧元的“下一代欧盟”计划。第二，为乌克兰长期战争做准备，利用飙升的油价（俄罗斯因油价上涨获得额外战争资金），通过发行欧洲债券或冻结俄罗斯资产，公平分担援乌财政负担。第三，建设真正的欧洲能源联盟，大幅投资电网现代化与跨境互联，打破成员国间的能源壁垒，加速审批可再生能源、核能与电池项目。

<https://www.csis.org/analysis/europe-needs-bold-economic-actio>

n-face-iran-shock

编译：黎彤

20、美国《外交事务》：特朗普外交政策缺乏原则且背离现实主义

3月31日，美国《外交事务》发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丽贝卡·利斯纳（Rebecca Lissner）和布鲁金斯学会访问高级研究员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的文章《“灵活现实主义”的虚假承诺》。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暴露出其所谓的“灵活现实主义”只是一种虚假承诺，其外交政策缺乏原则，更从根本上违背了现实主义的核心信条。真正的现实主义主张基于国家利益的务实考量，强调维护权力平衡、避免卷入代价高昂的外围冲突，反对把政权更迭视作有价值的外交目标。然而，特朗普政府以“强权即公理”为由放弃了军事克制。这场在缺乏明确政治目标下发动的对伊战争不仅耗资巨大，还挤占了应对大国竞争的战略资源。此外，特朗普在冲突中未能准确预判局势升级，反映出其政策盲目追求权力却忽视战略后果，不仅没有增进国家利益，反而削弱了美国的整体实力和威慑力。文章建议，未来的政策制定者应避免陷入过度理想主义或极端孤立主义误区，回归严谨、务实和自律的战略传统。在保持全球影响力和盟友紧密合作的同时，以目标明确、手段克制的方式运用实力来推进国家利益。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iran/false-promise-flexible-realism>

编译：陆知宜

编译：陆知宜、黄千茹、张泉、郜捷、黎彤、刘盈祺、陈奕好、贺宇希、高靓瑜、李泓静、王一凡、白一冰、刘晓、罗方婕、程果、钟珺雯、杜宛鸿、张佳延、张朔宁、高美琳、张方琼宇、孙韵雯

审核：许嘉伦、钱嘉童、刘源、郑乐锋、周武华、申青青